

上编——经济篇

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

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

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中编——文化篇

“五四”时期现代文化心理的觉醒

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民粹主义思潮

大后方文学：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缩

延安文学：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

下编——人才篇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

现代与古代不同的作家队伍状况

“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的知识构成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发生论

栾梅健 著

上编——经济篇

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中编——文化篇

“五四”时期现代文化心理的觉醒/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民粹主义思潮
大后方文学：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缩/延安文学：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

下编——人才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现代与古代不同的作家队伍状况/“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的知识构成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栾梅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栾梅健 著. —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大学丛书)

ISBN 7-5633-5817-X

I. 二… II. 栾…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72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75mm×97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5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200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前言

1992年,这本小书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在大陆没有公开发行,因而经常有朋友来电索要或当面垂询。

前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来上海。席间,他对我说道:“你那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还有吗?我正在准备写一篇有关《丛刊》百期纪念文章,你那篇谈稿费制度的文章是国内第一篇从外部关系研究现代文学的论文,想参考一下。”我赧然地摇摇头,答道:“都是十几年前出版的了,哪里还会有?”见他失望的样子,我又补充道:“前几年我在国内出了本《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内容上有些相同之处。”后来,我将广西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寄给了他。不过,严格说来,这两本书是完全不同的。

也是在前不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有位博士研究生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生问题,从网上搜索到我在台湾出版的这本小书,但到处寻找都无法获得,问我能否给他寄上一本。我和刘勇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前几年在俄罗斯进行学术考察时同居一室,相谈甚欢,似乎理应满足他的要求。但面对手中绝无仅有的一本样书,最后也只是给他寄了一本《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敷衍塞责。

说起来,最先向我索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应该是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头人的刘纳女士。那是1992年,拙著刚刚在台湾出版,我为了在大陆有些反响,于是便将《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一章试着投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并起了个副标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之一”。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素昧平生的刘纳女士的来信。她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信的

一段是这样的：

今天拜读了大作《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丛刊》编辑部送来稿件的审稿单上，董炳月对大作大加赞赏，并用红笔画了个很大的五星以作让我注意的记号，我还感到莫名其妙。但读过之后，便完全理解了他的红五星。我读了两遍，并且琢磨了好一会儿。您所说“他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职业作家大量产生这一根本的社会基础”，也包括我以前所写的一些东西。大作不但有说服力，而且有震撼力，许久以来，读文章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不知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什么时候能见书，我非常想得到一本。当然，是买……

刘纳女士自谦地说“想买”，不过当时自己是个穷书生，除了少许样书之外，我并没有到台湾业强出版社去购书，因而当时并没有给她赠书请她指正，这是非常抱歉且惭愧的事情。——这次大陆版出版后，当首先给她寄上一本，以了却我这长长十五年来的一块“心病”。

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大陆学者看到了这本小书。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修己先生在1999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拐弯道上的思考——二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随想》一文中，认为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有一种“向外拐弯”的趋向，并且认为“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继续前行的新潮流，并且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将拙著列为“成果初显”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承蒙黄先生的厚爱，在他受教育部委托重新修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时，主动邀请我承担《“前五四”文学》一章的撰写工作。现在这部教材已经出版，作为面向二十世纪的教材一种，受到了众多高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

……

或许有人会问，当初这部拙著为什么不在大陆出版而是选择了台湾？

或者,也有人这样说,既然拙著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与肯定,为什么不早点就拿回大陆出版,而让它成了一本不易寻找的书?其实这里面也还有些原委。

当时我写作这部拙著时刚刚三十岁,在学校里还只是一个区区讲师,在学术著作出版极其艰难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要想独立出版专著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记得是在1991年秋天,台湾业强出版社社长陈春雄先生到苏州来游玩(当时我在苏州大学任教,2003年才调入复旦大学)。见面是在竹辉饭店,我隐约表达了有一部专著试图在台湾出版的愿望,因为学术著作海峡两岸都难以畅销,当时陈社长只是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答应。第二天,我陪他去宜兴旅游,当时苏南一带还没有高速公路,在途经崎岖、弯曲的无锡太湖边“八道湾”时,颠簸的车辆使平常本来就晕车的我终于支持不住,在车辆里吐了个七晕八素。不过,考虑到陈社长是第一次到江南来游览,我还是打起兴致,满面笑容地给他讲述无锡太湖、锡山的传说,以及宜兴茶壶的种种知识与掌故。

晚上回到苏州,出乎意料的,陈社长主动对我说:“把书稿给我,几个月就出版!”我先是一愣,后是开心地笑了起来。他看着我说:“你不简单。晕车、呕吐已经很难受了,然而,你还能回过身来笑着给我讲话。”隔了一阵,他又补充了一句:“大陆版最好晚几年出版,否则,我的台湾版就不好卖了。”在当时,大陆的书很便宜,如果出口到台湾,对他肯定是个冲击。

1992年4月,业强出版社非常守信地将拙著出版了出来;而我,后来似乎也有好几次打算将拙著在大陆出版的机会与冲动。不过,我都控制住了。对于豪爽、义气的陈社长来说,我这十五年的守候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非常感谢郑纳新先生的诚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的业绩与口碑,常常地打动了,让我再次萌发了将这部拙著在大陆出版的兴趣。

为真实记录下我青年时代在学术上的足迹乃至难免的粗糙与轻狂,

除了个别校对中的错别字外,在内容上不作任何的改动,是非、得失就全赖读者诸君的判别与指正了。

栾梅健

2006年5月12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独辟蹊径 卓然成篇

——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贾植芳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长河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独特历史阶段。它不仅在语言上以白话代替了文言,以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平等并存的局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中以诗文为正宗的一贯格局,而且,在文学观念上也实现了一次彻底的解放。因而,被称作“新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异问题,而是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它的根源是什么?对它的基本评价又该是如何?这确实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当栾梅健先生的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一书,专门着力于探讨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转化的根源与契机时,便具有了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可贵的史识与新颖构想。

由于二十世纪纷纭变幻的政治斗争形势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明显差异,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会带有趋时性、政治化的倾向,稍一疏忽,便会有图解政治之嫌。真正沉浸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料中去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保持一个纯正、冷静的学术研究头脑,才有可能得出一些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也是文学研究成果长久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必然要求。值得高兴的是,栾梅健先生并不对政治有急功近利的要求,而是一位甘守蜗居、愿意坐在冷板凳上认认真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在本书中,他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转变的动力与契机放在“经济篇”、“文化篇”和“人才篇”这三部分中加以思考,便是他致力于纯正学术研究的有力证明。当然,这并不是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可以与政治毫无瓜葛,可以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但是,只要对历史知识稍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任何政治的运动与形式都是当时特定经济状况与

社会情形的反映,都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因而,当栾梅健先生从二十世纪的经济状况与文化背景切入,去思考二十世纪的文学是如何产生与为何产生的问题时,便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与更为可靠的材料基础。在本书中,栾梅健先生对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原因的探讨,关于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对文学观念转变的论述,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对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等等,都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他纯正的学术研究心境与广阔的学术研究视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一些高科技成果对现有文学样式的冲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又将会在内容与样式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相对于以往的几千年传统文学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学阶段,而与二十一世纪文学也会有极大的差异。因而,从发生论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就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形成的由来,而且对于人们探讨二十一世纪文学的走向及其特点,自然也就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愿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取得更为深入的成果!

是为序。

(贾植芳,现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缘起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已经空前响亮地回荡在国内学人的脑中。先有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①揭槩于前,继有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②、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瞥》^③、李劫的《中国新文学主潮绪论》^④……相继于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者称之为“中国新文学”,正以与往昔全然不同的面目大踏步地走进文学史的研究领域。

不过,上述论著大都还仅仅只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的轮廓性勾勒与史论性阐释——一种基于对这一时期独特文学现象的初步感悟与匆促印象,而且,各自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也导致了研究上的歧异。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复杂曲折、变动不息的庞大体系?到底有哪些因素支撑了这一阶段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学为何会形成迥然不同的面貌?外国文学为何会以如此独特的形态影响与作用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各种文学主张与文学潮流之间又为何会如此纷然杂陈、此消彼长?如此等等的问题,在上述学者发出颇富启示意义的、预言式的召唤之后,也给学术界留下了亟须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空间。只有进一步以翔实、可靠的史料还文学史的本来面貌,以科学的严谨态度消除在匆促感悟之中所产生的思想迷雾,才能真正突现与确定这一阶段文学的本质特征与艺术品位,使“二十世纪中国

① 《文学评论》1985年5期。

②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黄河》1987年4期。

④ 收入《个性·自我·创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文学”真正卓然独立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要选取一个有利的观察视角:一种既能最为贴切地指出这一阶段文学的基本特征,又能提供人们作出全景式鸟瞰的思维线索与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是自《诗经》以来我国数千年漫长的文学历史中极其特殊的一个文学阶段。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兴盛,使文学传播手段大大提高;1905年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在改变着人才培养方式的同时,也大大地扩展了作者队伍与读者群体;稿费制度的确立,使作家的精神产品可以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料,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这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根本区别于传统文学的地方。如何来观照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并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建立起与这一时期文学崭新的有机联系?一切偏重于文学本体研究的批评方法与体系,诸如精神分析方法、原型(神话)批评方法、形式主义、语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等,都可能会偏执于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评价。因为它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它是为何产生并如何生成”的问题,而不是对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进行的具体研究。这自然就需要一个涵盖面极广、并能真正体现与这一时期文学存在对应关系的分析观点与研究手段。

在这里,率先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极具启迪意义。法国当代评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方面是文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广为传播,两者在1800年前后达到了临界点。正是在这时,文学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①埃斯卡皮是在评价著名文艺社会学家斯达尔夫人时说这番话的。在1800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首次尝试把文学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著。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知识的专门化促使科学和技术活动逐渐脱离了严格

^①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页8,法国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范围缩小。然而同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文盲的逐渐减少,从前作为一小批文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文学成为提高广大民众智力水准的手段。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家当做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做传播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做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种在人们传统的眼中颇有渎圣之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必需的工作。继斯达尔夫人之后,特别是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创立实证社会学以来,文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深入。在不断完善着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当准确地映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文学面目与文学流派。

中国历史似乎恰巧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当1800年斯达尔夫人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环境对作家发生着从未有过的直接快速的影响时,当时中国的文人还沉浸在繁琐考证、经世致用的迷梦之中。关于十八世纪,或者十七世纪、十六世纪,乃至更早时间的文学状况,尽管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也仍然相当明显地在文学中打下了各自的印记,然而,它们却都缺乏像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这样一些因素对文学发展所带来的根本性质的变动。它们都仍然属于封建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并不带有工业革命的性质。只有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原有的缓慢发展过程才被迫进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中国历史才开始了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质的变化。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变动。在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前后,这种变动便已从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与沿海地区,扩展到几乎全国的所有地方。在政治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式开始了争民主、争自由的社会变革;在经济上,随着殖民势力的侵入,近代工业文明沉重打击了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在文化上,由于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和出国留学制度的实行,欧风美雨如大江大潮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心理堤岸;在社会成员的组成上,不仅第一次出现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而且也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具有职业特点的知识分子……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国历史步入二十世纪

的关头,发生在距斯达尔夫人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百年之后的中国。

现代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包含有下列三个要素:一是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上来分析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就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指出个人主义文艺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危机感的小说建立在个人垄断时代之上、创造力趋向消失的小说建立在国家垄断时代之上那样^①,着力揭示出社会史对文艺史的具体影响。二是用社会学的具体方法(如统计调查法)来从事文学研究。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是人们的精神产品(在近代社会则更具有“商品”的意味),注重研究这一产品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产品的创造者——文学艺术家同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书展等)对文艺创作的影响;还研究文艺作品的消费,谁消费了什么?为什么?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客观而公允的看法。三是扩展文艺社会学与其他各学科的联系。不仅把文艺作品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且也看作是一种审美事实。这是现代文艺社会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接受美学、艺术心理学,乃至其他一些着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的长处,都可以被吸收拢来加以运用。现代文艺社会学已经不满足于论证特定作品同特定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对文艺的社会关系作出单向线性的解释,而是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考察文艺的社会关系,注重对整个文艺社会史作出评价。无疑,这给我们的课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保障。

这是一个诱人的课题!这也是一项极需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

让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与耐心来进行一次长途的跋涉吧。因为,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且我们还将站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起跑线上!

① 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法国加利玛出版社1970年版。

—目录—

前言	1
序	贾植芳 1
缘起	1
上编——经济篇	
一、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	3
二、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17
三、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	32
四、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48
中编——文化篇	
一、“五四”时期现代文化心理的觉醒	65
二、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民粹主义思潮	82
三、大后方文学: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缩	96
四、延安文学: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	112
下编——人才篇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者群体的转变	127
二、现代与古代不同的作家队伍状况	143
三、“五四”和新时期两代作家的知识构成	164
余绪	180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183
后记	185

上编——经济篇

- 
- 一、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
 - 二、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 三、社会形态的嬗变与文学主题的流向
 - 四、文体革命的要求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 

一、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文学兴盛的契机

在我国几千年漫长的文学历程中,记录工具与传播媒介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不能不极大地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东汉蔡伦对造纸术的改进,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无疑都对我国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尽管这些改进与发明在当时都走到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它们都还停留在手工操作的阶段,并且绵亘千年不变的固定程式,也都使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国家一样,保持着相对静止、迟缓的文学进化历程。只是到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工业社会之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①尽管阿英非常遗憾地没有具体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于晚清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就根本不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页1,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